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3.02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新时期”指1980年至今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狄更斯学术史可以分为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前14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是我国狄更斯研究的繁荣时期。第一阶段我国狄更斯研究的范围明显扩大,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占了较大比重。第二阶段我国狄更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日益多样,新方法的运用层出不穷。

关键词:新时期;中国;狄更斯;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3-0137-08

China's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Charles Dickens in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ZHAO Yan-qi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years from 1980 to the present in China's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 is being recognized as the “New Period”, which represents a time of increased scholarship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Charles Dickens. The New Period is divided into two separate periods, i. e. the last 2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14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first period, China's research on Charles Dickens' body of work focused on overall comprehensive studies, while in the second period, China's scholars have been working on larger research teams to increase the scope of their study objectives and extend their fields of research, while utilizing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working with new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tackle Dickens' large body of work.

Key words: New Period; China; Charles Dickens; academic history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狄更斯研究的一个关键时期。1980年之后,国内的狄更斯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由文革时期的停滞逐步走向繁荣。1980年全国各类报刊共发表狄更斯研究方面的文章14篇,比1979年的7篇翻了一倍。如果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卷为例,1981年收录狄更斯研究方面的文章和文章目录共12篇,1982年16篇,1983年17篇,1984年13篇,1985年13篇,考虑到还有不少没有收入的文章,这一时期国内的狄更斯研究不仅回复而且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并为21世纪的更大繁荣做好了准备。

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可从译介、论文和专著三个方面探讨。

1 译介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化进入全面复兴期。百废待举,翻译界与出版界首先的工作是再版以前出版过

收稿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YJA752040);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欧美日经典作家系列”子项目“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作者简介:赵炎秋(1953-),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

的狄更斯作品,同时出版新的译本。到90年代,狄更斯的15部长篇小说和主要的中短篇小说都有了中译本。90年代的狄更斯作品翻译开始向纵深发展:即对已经有了中译本的狄更斯作品进行再翻译。整个90年代,狄更斯长篇小说的新译本明显增加,达33种之多。在众多版本的竞争之中,一些译得较好的版本逐渐得到公认。上海译文出版社从80年中期开始,到1998年,选择了19种比较经典的译本,结为《狄更斯文集》,统一推出,在国内读书界、翻译界和研究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这19种译本包括狄更斯的15部长篇小说以及《博兹特写集》《圣诞故事集》《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和《中短篇小说选》。众多的版本相互竞争,可以说是整个80、90年代狄更斯作品翻译的一个新的特色。

另一个新的特色是狄更斯作品的各种异本如缩写本、节译本、改写本、编译本、英汉对照本、英文注释本、影印本、注音本和连环画本的大量出现。

缩写本、节译本、改写本、编译本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愿意阅读狄更斯的作品但又因时间不够或阅读水平不高而不能阅读狄更斯作品全本的那些读者的要求。四者之间有相同点,即都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了压缩和改写,都一定程度地降低了阅读的难度。但也有一定的区别:缩写主要是压缩篇幅,选出精华,但要求完整;节译本主要是选译精华,不一定要完整;改写本则要求改写者用自己的语言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重写,不要求与狄更斯的原文对应;编译本则比改写本更加自由,编译者可以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改写,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加入原作中没有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英汉对照本、英文注释本、影印本主要是为了满足一部分英语水平较高的读者学习英语、阅读原著的需要而出版的。但严格地说,影印本如果未经原出版社的授权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因此,在中国于1992年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这种影印本基本上就没有了。

注音本和连环画本主要是针对少年儿童的需要而出版的。注音本一般选择简易读物注上汉语拼音,以供儿童学习汉语拼音之用,当然,也可用于成年人学习普通话。连环画本主要是满足少年儿童阅读狄更斯作品的需要,由于它字画并茂,受到少年儿童特别是儿童的欢迎。

狄更斯作品的各种异本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了狄更斯作品翻译出版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社会对狄更斯作品需求的旺盛和多样化。

国外狄更斯研究成果的译介方面,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几本狄更斯的传记,如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蔡文显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安德烈·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朱延生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埃德加·约翰逊的《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林筠因、石幼珊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T. A. 杰克逊(Jackson, T. A.)的《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范德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英)M. 斯莱特(Slater, M.)的《狄更斯与女性》(麻益民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此外,还出版了一本学术性的译文集,即罗经国编选的《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此外,一些杂志也发表了部分国外学者的狄更斯研究成果。如李吟波译,(苏)Д. 乌尔诺夫著的《果戈里与狄更斯》(《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8期);聂振雄译,(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的《狄更斯诞辰一百周年》(《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6期);周殊平译,乔纳森·亚德利著的《狄更斯在美国》(《文化译丛》1987年第4期);刘琦岩译,(美)罗蒂著的《海德格尔,昆德拉,狄更斯》(《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0期)等。

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1954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对狄更斯的生平与创作作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作者对狄更斯创作总体上是肯定的。伊瓦肖娃运用的是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她喜欢将狄更斯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形成、发展及其原因。在分析具体的作品前,作者总要先大段地综述与这一作品有关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方面的情况。对于有助于理解狄更斯及其创作的材料,伊瓦肖娃的介绍十分详细,而狄更斯具体的生平事迹,如果与其思想、创作没有密切的关系,则往往会被她忽略。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介绍到国内的时候,正是中国狄更斯研究快速恢复、对外界的大门打开不久的时候,评传丰富的资料、细致的分析和鲜明的观点对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国内的狄更斯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它的过分执着的两大阵营的划分、过分坚守的俄苏式的社会主义传统、以及过分单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对国内狄更斯研究者们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如果说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坚持的是俄苏文化传统,那么罗经国编选的《狄更斯评论集》传播

的则主要欧美学者思想。这部译文集收集了爱伦·坡、理查·豪恩、亨利·詹姆斯、乔治·吉辛、吉·基·杰斯特顿、肖伯纳、托·斯·艾略特、乔治·奥威尔、爱德蒙·威尔逊、威廉·燕卜生等30位作家的有关狄更斯的重要评论,除了卢那察尔斯基是俄苏批评家之外,其他都是欧美批评家。这些作家从思想内容、艺术技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心理分析等不同角度对狄更斯作品及狄更斯本人进行分析。论集的内容丰富,观点多样,富于启发性。美国学者韩南认为,“19世纪外国人著译的汉语作品,几乎都需与华人助手联袂协作,才得以完成。”中外文化的交流,译介起了重要作用^[1]。这些传记与译著的出版,对开阔国内学者的视野、提供研究方法、增进国内学者对狄更斯及其作品的理解、促进国内狄更斯研究的发展,都起到了好的作用。

2 论文

这一时期国内报刊发表的有关狄更斯的文章为350篇左右,其中,学术性论文约为200篇,平均每年10篇左右^①,是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主要成果。

思想方面,上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批评仍是重要的批评视角与方法,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仍是研究者们喜爱的话题。这一时期的论文,光是题目上明确标示出“人道主义”这一关键词的,就达14篇之多。但这一时期对狄更斯人道主义的探讨仍主要是从狄更斯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其人道主义的两面性3个方面进行,并没有超出60年代杨耀民等学者论述的范围^[2]。倒是一些比较性的论文,由于视野的扩展及新的研究对象的引入,给人带来一些新的感觉。如湖晴的《人道主义的三座丰碑——〈双城记〉〈九三年〉〈日瓦戈医生〉之比较》。文章认为狄更斯的人道主义以“温和”为特征。他对法国革命的否定从总体上“有欠准确和公允”,但其中又有“合理成份、正义因素”^[3]。

另一部分学者则突破人道主义的范围,从新的角度切入狄更斯作品思想的研究。1987年,赵炎秋发表文章指出:“狄更斯思想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是他的人道主义更多地侧重于伦理道德的范畴。”“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他所批判的重大社会罪恶,几乎都是属于道德的范畴,如自私、卑劣、残忍、高傲、欺骗、冷酷无情,等等。他认为只要清除了道德上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就会变得美好起来。”“狄更斯的道德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4]核心层次是高尚、诚实、仁爱,中间层次是正直、勇敢、无私、利他、厚道、真诚、通情达理等,表面层次是人们的教养、生活作风、处世态度如文雅、谦和、稳重、严谨、温柔、有礼貌、自尊、尊重别人、举止得体等。文章突破了49年以来国内狄更斯研究的传统的社会—政治视角,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狄更斯研究,扩大了狄更斯的研究领域。1989年,朱虹发表文章,认为“狄更斯是文学史上不多见的把高度的思想性和广泛的娱乐性结合起来的作家。”“除了我们心目中的狄更斯——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逆,还有另一个狄更斯——迎合大众趣味的通俗小说作者。若要全面了解狄更斯,他的这一面不容忽视;从考察某些文艺现象的角度,他的这一面亦有启发性。”“作为通俗小说作者的狄更斯为追求销售量,尊重中产阶级的社会偏见,表达他们的心理和感情要求,迎合他们的欣赏标准。总之,狄更斯的作品作为通俗小说来看,处处都打上了中产阶级的理想和趣味的烙印。”^[5]狄更斯作品的“中产阶级的体面”、性道德的纯洁、感伤、恐惧和悬念等侦探小说因素,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考察。现在看来,朱虹这篇文章很明显受到了西方一些评论家的影响,对狄更斯小说中通俗、市场的一面有所夸大。但这篇文章的确开阔了国内狄更斯研究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角度,有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狄更斯及其创作。1992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在研究动态栏发表署名为“宁”的作者的文章《狄更斯能纳入后现代主义话语吗?》。文章引用美国梵得比尔大学克莱登教授的论文的观点,指出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研究狄更斯。狄更斯对于意识形态影响未及的“素朴的”或不受重视的叙述程式的运用,他的作品中的那些性情乖张、行为异常的角色,他的创作中的追求狂欢化,崇尚戏谑模仿,他在晚年创作中致力于将几无联系的小说人物拉扯到一起,等等,都与后现代主义有密切的联系,或者可以看作后现代主义创作的先声。这篇文章虽然只是一篇介绍性文字,但它在国内狄更斯研究中引入了一个新的话题,有利于狄更斯研究领域的开拓。

此数据根据笔者和笔者的研究生在湖南师大图书馆、北京师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知网、读秀网等网站上的资料整理而成。后面所有有关国内狄更斯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此,不再注释。

人物仍是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重点之一。受80、90年代流行的系统、信息、控制等“三论”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倾向于将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整体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赵炎秋先后发表《外化——狄更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法》(《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论狄更斯小说人物的基调化倾向》(《湖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狄更斯小说人物的类型与发展》(《湖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5期),《论狄更斯笔下的双重人格人物》(《湖南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论人物在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位置》(《求索》1995年第4期)等5篇文章,对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进行深入分析。周颐在《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1、2、3期上连续发表《兼容了历史与喻指价值的人物: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一》、《呼唤着人类同情的艺术形象: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二》、《表演出舞台效果的喜剧性: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三》等三篇系列论文。论文篇数不是很多,但集中讨论狄更斯作品中的扁平人物,因而比较深入、细致。文章针对部分批评家对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扁平人物”不真实、类型化、怪诞滑稽的批评与责难,指出,狄更斯小说中的“扁平人物”既是“历史的生活样本”,又具有超越时空的喻指价值,他们身上所隐含抽象喻意,能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中落实到具体的现实人物或具体对象上。狄更斯笔下人物的性格虽然单一,但作者以善、恶为参照,将其组成彼此对立与对照的人物系统,在对照中描写维护和弘扬人性的善良品质而在这个系统中,恶的人物几乎都归于可耻或可怜的下场,而善的人物几乎都有满意的归宿。这样,狄更斯惩恶扬善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由人物形象本身所体现的人情与人性的要求,就会使读者产生更强的共鸣,留下更深的印象。在人物塑造上,狄更斯倾向于采用传统的戏剧手法来描写人物形象,他让人物不停地行动,以唤起其活力,同时以精采的人物话语增添人物的艺术情趣,使其喜剧性格表现出一种舞台效果。此外,任明耀对狄更斯笔下的怪人形象,郭珊宝对狄更斯笔下的儿童形象,余迎胜对《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妇女形象等,也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6]。

艺术方面,受益于80、90年代对文学作品审美性和艺术性的重视与强调,这一时期狄更斯小说艺术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涉及到狄更斯小说艺术的各个方面。朱虹、赵炎秋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对狄更斯小说的结构、幽默、心理描写、人称和视角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在创作方法方面,占主流地位的看法仍是认为狄更斯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在此基础上,赵炎秋进一步提出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是感受型的,它既和福楼拜的客观型现实主义也与浪漫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7]。赖干坚则认为:“狄更斯的创作方法的特点便在于他把现实主义方法和浪漫主义方法紧密结合。”^[8]创作艺术上,潘耀琨认为,狄更斯的小说“题材丰富,形象鲜明,浮雕式地展示了一幅幅绚丽多采的生活画面。狄更斯善于以个别人或一家人的生活为中心组织情节,透过情节提出当时公众所关心的社会基本问题,使作品主题突出,线索分明,形成了他的创作的显著艺术特色。”^[9]李肇星认为,狄更斯的景物描写情景交融,喜用漫画、幽默与讽刺,他不仅善于在运动中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而且善于以拟人化的手法把静物写得栩栩如生^[10]。蔡明水认为,“狄更斯把象征手法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运用,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深度,给小说增添了诗的意境。”狄更斯的象征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大部分象征产生的意境是明朗清晰的,如大雾并不象征天地间的‘神秘力量’而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暗示的抽象概念可以从它固有的属性引伸而得,不是作者随心所欲外加的。”另一方面,狄更斯小说中的象征不影响主题的表达。如《荒凉山庄》的主题是明显的,“对一个认为雾就是雾的读者来说仍然是显而易见。然而我们一旦领悟了象征的内容,便可以进入一个更幽深的意境,超越作品的时空限制,看到更远更本质的意义。”^[11]郭珊宝肯定狄更斯的夸张,认为他的夸张是一种童心式的夸张,作者具有一双“孩子第一次看世界的慧眼,所以‘能够找到’那些‘值得夸张’的事物。”^[12]赖干坚认为:“狄更斯的创作方法的特点便在于他把现实主义方法和浪漫主义方法紧密结合。”^[8]罗经国接过林纾的评论,仔细分析了《荒凉山庄》的锁骨观音结构,认为小说庞大复杂,但狄更斯“别具匠心使小说的情节、主题、象征和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扑朔迷离的故事跌宕起伏,浑然成为一体。”^[13]伍厚恺认为,一般说来,狄更斯的小说并不以构思完善、布局精巧见长。但《双城记》不同,它“紧紧围绕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成功地安排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平行对照和对比关系。”这是其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14]。研究者们抓住狄更斯小说艺术的某一方面,各抒己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比较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中出现可喜的增长势头。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既可更好地理解狄更斯的作品,也可进一步了解狄更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同时,比较研究也是中国学者

学术视野扩展的表现。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论文共24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与国外作家比较,用来比较的作家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雨果、萨克雷、劳伦斯、哈代等。其二是国内作家与狄更斯的比较,主要集中在老舍与狄更斯的关系上。9篇文章有8篇分析狄更斯对老舍的影响和两人的幽默与讽刺,一篇文章分析两人笔下的小人物。彭禄茂对两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早期的老舍不象狄更斯那样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他受狄更斯的影响主要在于社会思想、伦理道德和艺术情趣上,尤其是后者。老舍多次谈到他那时认为自己是搞文学的,不必过问政治,并以此自命清高。”但他并不像狄更斯那样对资本主义社会持肯定态度,“他与狄更斯的不同在于:他没有狄更斯那样对资本主义怀有深厚的感情。老舍观察社会更冷静和客观,没有狄更斯那样对乌托邦理想的盲目乐观。并且,他总的政治观点也不象狄更斯铁板一块。抗战爆发后,老舍的政治热情大大增强,政治倾向也逐渐明朗,由于经常接触进步人士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建国之后,有时甚至因为要突出政治而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15]。袁荻涌认为,老舍是通过阅读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作品,才产生了创作的欲望,进而成为著名作家的。老舍的幽默受到狄更斯的影响,但“老舍对狄更斯等人的幽默风格的借鉴,并非一味照搬,而是有着很强的主体意识,是有取有舍的。……狄更斯的幽默很少和深刻揭露社会黑暗本质结合起来,缺乏强烈的批判意识。……在老舍幽默诙谐色彩的后面,我们感觉到的是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在含泪的笑中,处处显示出作家对中国社会无与伦比的洞悉,对民族文化心态的深沉思考和尖锐抨击。”老舍的现实主义、他以底层社会为自己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等特点,也与狄更斯有关。“狄更斯以城市贫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以小人物的不幸命运为主线的现实主义精髓,启发了老舍,使他发现自己也拥有同样丰富的艺术宝藏,也有可任意驰骋的艺术天地。……从狄更斯小说中,老舍领悟到自己应该追求的艺术目标,明确了自己可以为之奋斗的方向。……老舍作品的这种庶民性,固然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得益于他丰厚的生活积累,可是我们也不能排除狄更斯对他的启迪和影响。从描写对象和抨击方向的一致性上,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影响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老舍也很喜欢康拉德、威尔斯、赫胥黎等英国作家,但这些作家却没有象狄更斯那样对老舍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描写的生活与老舍自己的生活经历相距较远。”^[16]这些分析与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着狄更斯在国内读者中的影响的加大,和相关译本的增多,这一时期开始有学者对狄更斯作品的翻译以及国内研究情况进行研究,发表了一批成果。学术史研究论文有两篇,分别是赵炎秋的《建国后狄更斯研究述评》(《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葛桂录的《“善状社会情态的迭更司”——民国时期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后者论述民国时期国内狄更斯研究,前者论述建国后至1996年国内狄更斯研究,两篇合章合起来,正好对1907年以来90年的中国狄更斯学术史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

三 专著

论文的篇幅毕竟有限,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感到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大规模地展示出来;另一方面,随着狄更斯影响的增加,也迫切需要全面系统地向读者介绍狄更斯及其创作。这导致了研究专著和知识性著作的出现,这是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明显进展。

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著作共有11种^①,其中学术性较强的是朱虹的《狄更斯小说欣赏》、赵炎秋的《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和薛鸿时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评传》。

《狄更斯小说欣赏》是朱虹在自己写的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全书收集了16篇文章和一篇《代序》,分别评论除《德鲁德疑案》之外的狄更斯的14部长篇小说,和他的《博兹特写集》与《圣诞故事集》,《代序》为朱虹写的另一篇文章《评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这本小

分别是:1、陈挺:《狄更斯》,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2、张玲:《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3、朱虹:《狄更斯小说欣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傅先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狄更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5、王治国:《狄更斯传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6、谢天振:《深插底层的笔触:狄更斯传》,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上海分公司1994年。7、赵炎秋:《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8、薛鸿时:《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9、徐澜:《狄更斯:我撞上了你的眼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10、童伟钢:《狄更斯》,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年。11、车雷:《雾都明灯:狄更斯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书记录了、汇集了笔者在重读狄更斯时的一些零碎的感受,难免带着个人感情的色彩,无意追求什么体系。当然,任何评论,都包含着某种方法论的前提。我想,在评论中,实事求是从形象出发,从广义的文艺反映现实的基本规律出发,总能捕捉到原作精华的点滴。”^[17]¹⁹¹本着这种目的,专著的每篇文章集中谈狄更斯小说的一个方面,力图写出作者个人的见解。如,《博兹札记》这一章侧重分析狄更斯对伦敦特别是伦敦底层社会的描写,狄更斯敏锐的观察力、惊人表现力。作者特别指出:“狄更斯作品中的许多思想、艺术特点都在《札记》里初见端倪。若是先读完狄更斯的16部小说杰作,回过头再读他出版的第一部书《博兹札记》,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正如有的评论所指出的,如果说狄更斯的全部作品可以比作一部宏伟的戏剧,那么《札记》可以说是一次‘彩排’。”^[17]¹⁷《匹克威克外传》侧重分析匹克威克先生的主观想法与客观现实的脱节,指出作者通过“既逼真又逗乐”人物、场景与事件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通过“匹克威克这些滑稽化的形象”来“歌颂真善美”。《大卫·科波菲尔》侧重分析小说的重叠镜头。作者认为,《大卫·科波菲尔》属于欧洲文学传统中“少年成长”的题材的作品。小说的主题便是“人生”。“作者通过大卫的形象和他的一生命运表现他所理解的人生,探索人应该怎样了解客观世界、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大卫善于童年时代的回忆都在远方中包含成人的智慧和过来人的心情,但同时又不失真,仍然符合儿童的心情和语气,象一种重叠镜头似的,使读者既看到孩子的形象又感到他长大成人以后的心灵。”^[17]¹²⁷这正是小说写作的一个特点,也是表达作者构思意图的一个重要方法。《双城记》讨论小说所提出的双重的警告。作者认为小说的故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马奈特(一译梅尼特)医生一家的故事,一个部分是以德法治夫妇为中心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与暴力场面。前者是充满爱的世界,后者是充满恨的世界,小说最后的结局是爱战胜了恨。作者认为,小说是向“剥削、统治阶级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它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场面,具体而形象地预示了英国社会的前景,向剥削、统治阶级指出,象小说中的圣爱弗雷蒙(一译厄弗里蒙地)侯爵一样,他们播下的种子也只能结成同样的苦果。”“但这警告也是双重的,既是对剥削、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对革命人民的一个警告……似乎革命一旦得逞,就会失去控制,使革命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双城记》也是对革命人民的警告,提醒他们暴力本身的逻辑会把他们与压迫者一起推向毁灭、同归于尽。”^[18]专著形式活泼,论述灵活,见解虽不系统,但常见精彩之处。

赵炎秋的《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也是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作者具有较强的整体与系统意识,把狄更斯的15部长篇小说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思想、人物、艺术3个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深入到狄更斯小说的各个方面,而在具体的论证中,又未停留在一般的泛泛而论上,把研究变成纯理论的阐释,而是深入到狄更斯小说世界中,对小说进行具体入微的分析,于具体分析中形成观点,反过来,观点又指导了对作品的分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比较紧密。全书有较强的对话意识,作者的视野比较广阔,掌握的材料比较丰富,在研究的过程中,常有意识地针对国内外狄更斯研究中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进行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作者对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英国作家兼批评家福斯特认为狄更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扁平人物,而扁平人物的价值没有圆形人物高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既有扁平的也有圆形的,并从理论与文学史事两个方面论证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各有价值,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并进而从人物性格内涵的多少和人物性格的内涵有无变化两个方面,把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分成静止中的简单人物、发展中的简单人物、静止中的复杂人物、发展中的复杂人物四种类型,这就比福斯特的看法更为深入,同时也更符合狄更斯小说的实际。

思想方面,专著认为,狄更斯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是复杂的,而最重要的3个侧面则是对19世纪英国(包括美国)社会的批判,对伦理道德的宏扬和对人性的关注与探索。狄更斯小说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而这人道主义侧重的是伦理道德的范畴,其基础是人性。因此,狄更斯的道德观与人性本质上是同一的。它们构成了狄更斯小说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这又是狄更斯小说对社会的批判的基础与出发点,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作品、情节与细节中,三种思想的体现又不是同等的,而是各有侧重,主次有别的。这样,三个侧面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配合,形成一部复杂而又和谐的三重奏,构成狄更斯小说思想内容的主体。

人物方面,专著从人物在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位置,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系列,人物的特点,人物的类型与发展,以及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变态人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该书认为,人物在狄更斯长篇小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整个小说的中心,小说的整个系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构建的。狄

更斯小说中的人物众多,其性格行为各不相同,千姿百态,但是也有着这样与那样的联系。作者长期注意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人物,把他们在作品中艺术地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人物的系列。专著认为,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该书从人物性格的单层次、人物本质的确定化、人物形象的基调化、人物的明晰性、深厚的人性内涵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专著从简单与复杂、静止与发展两个方面讨论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并据此把狄更斯笔下人物分为四个大的类型:静止中的简单人物,发展中的简单人物,静止中的复杂人物,发展中的复杂人物。书中还讨论了狄更斯小说中的变态人物,认为变态人物是狄更斯小说人物的一个重要的类别,并进而从怪人与双重人格人物两个方面,讨论了变态人物的具体表现与特点。

艺术方面,专著认为,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是描写自己的感受世界,这种感受世界既保持了现实生活原貌,又渗进了作者浓厚的主观因素,狄更斯小说结构的典型模式是多元整一。所谓多元,是指狄更斯小说是由多个叙事单元组合而成的;所谓整一,是指这些单元虽然各自独立,但又通过人物、情节、线索等互相联系、渗透、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多元整一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散而严谨、网状结构、人物中心。狄更斯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他不像意识流派作家那样,运用内心独白、时空错乱、自由联想等手段,尽力揭示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也不像托尔斯泰等作家那样,通过作者的笔触,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刻画,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描述给读者,而是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把人物的内心世界转化为可感知的外部形象,通过人物的内心间接地显示出来。该书把这种描写方法称为内心世界的外化。此外,该书还讨论了狄更斯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二元对立原则,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称与视角,以及狄更斯小说中的幽默,等等。

薛鸿时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评传》,全书共分24章,以狄更斯的生平为线索,侧重对狄更斯作品的分析。薛鸿时不同意将狄更斯看作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认为,“狄更斯天生具有浪漫主义气质,他瑰丽的想象时时形成强大的张力,总想突破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临摹。”^{[18]285}因此,对狄更斯的研究决不能满足于指出狄更斯小说对英国社会的批判,更应深入认识狄更斯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狄更斯的创作充满诗的激情,笔下人物往往超越现实生活的范围。狄更斯的小说一方面忠实于现实,另一方面又超越现实,运用现实的材料来表达他的道德理想。薛鸿时将狄更斯小说的这种特色称为“浪漫的现实主义”,并将这一观点贯穿到对狄更斯小说的分析之中。

在分析的过程中,作者不倾向做抽象的理论探讨,而是结合故事内容,在对情节、人物的介绍与分析中蕴含自己的观点,得出相关的结论。由于与作品结合紧密,评传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第15章对《大卫·科波菲尔》的分析。作者先介绍小说的蕴酿与准备,然后介绍小说的主要情节,然后分析小说的风格,认为在小说中,狄更斯“将自传与虚构、细节真实和丰富想象揉合起来,使之浑然一体,成为具有最高品位的艺术精品”。最后得出结论:“狄更斯的艺术决不能简单地归入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范畴,无论早期、中期或后期,他始终和浪漫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称他是一位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家也许更准确些。”^{[18]160}这种分析方式比较符合评传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四 结语

对于中国的狄更斯研究来说,80、90年代是一个重要时期,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步入正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的逐步繁荣,文化上的面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开放,中国的狄更斯研究也走向繁荣。80年代早期的研究还有着传统观念的束缚,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这种束缚也逐步消失,新的思想与新的观念不断涌现,形式方面的创新也常有出现。

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首先,研究范围明显扩大。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几部传统的重要作品,而是扩展列狄更斯的整个创作。狄更斯所有长篇小说和部分其他作品如游记、中短篇小说、演讲集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研究的对象。自然,在研究范围扩大的同时,重心仍然存在,几部重要作品如《双城记》《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等,仍是研究者们注意的中心,有关的研究文章也最多。

其次,突破了过去那种一元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这一时期,改变了十七年时期向苏联一边倒的现象,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观念与方法。研究上,不再局限于思想内容的范围,艺术方

面的成就与特点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论文试图淡化内容与形式的界限,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狄更斯的作品。另一方面,在分析思想内容的时候,研究者们也不再局限于社会—政治层面,而开始在其他层面进行探索,并且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人文层面,这一层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中取得长足进展,成为和社会—政治层面并峙的另一高峰。

第三,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占了较大比重。随着狄更斯研究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单篇作品的分析越来越显得不够。对狄更斯的整个创作进行总体把握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而单篇作品分析的积累和狄更斯大多数重要作品和有关资料的翻译出版又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们纷纷跳出单篇分析的老路,以狄更斯的几部作品乃至整个创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更好地把握狄更斯的创作,找出某些更本质更有普遍性的东西。由此促进了狄更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第四,系列论文的大量出现。与共和国前30年的狄更斯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出现了大量的系列论文。部分研究者不满足于单篇论文的零敲碎打,而是有计划地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便不断地深入,这导致了系列论文的出现。首先采用这种形式的是朱虹。接着,赵炎秋从1987年开始,至1996年,连续发表了《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等14篇文章。此外,郭珊宝、周颐、任明耀、赖干坚、王力、金嗣峰、臧传真等也都发表了两篇或两篇以上的系列研究文章。系列论文是文学研究中的重磅炸弹。它能够广泛深入地进入研究对象,促进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在这一时期的大量出现,说明了狄更斯研究的深入和学者专业化程度的加深。

参考文献:

- [1] 韩南. 汉语基督教文献:写作的过程[J]. 中国文学研究,2012(1):5-13.
- [2] 杨耀民. 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J]. 文学评论,1962(6):19-47.
- [3] 湖晴. 人道主义的三座丰碑——《双城记》、《九三年》、《日瓦戈医生》之比较(续)[J]. 南京高师学报,1998(2):7-12.
- [4] 赵炎秋. 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影响[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74-81.
- [5] 朱虹. 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J]. 外国文学评论,1989(4):89-96.
- [6] 任明耀. 狄更斯作品中的“怪人”形象[J]. 外国文学研究,1981(4):89-96.
- [7] 赵炎秋. 描写感受世界——论狄更斯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4):40-44.
- [8] 赖干坚. 狄更斯的创作方法特点浅论[J]. 厦门大学学报,1990(1):111-116.
- [9] 潘耀球. 狄更斯创作的艺术特色[J]. 外国文学研究,1980(2):98-102.
- [10] 李肇星. 狄更斯描写景物的几个特点——读《游美札记》[J]. 外国文学研究,1982(1):37-40.
- [11] 蔡明水. 狄更斯的象征手法初探[J]. 外国文学研究,1985(2):38-44.
- [12] 郭珊宝. 狄更斯小说的夸张[J]. 外国文学研究,1987(4):47-49.
- [13] 罗经国. 试论《荒凉山庄》的锁骨观音结构[J]. 国外文学,1993(4):12-18.
- [14] 伍厚恺. 论《双城记》的艺术特色[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57-62.
- [15] 彭禄茂. 老舍的思想与狄更斯[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3):9-15.
- [16] 袁荻涌. 老舍与英国文学[J]. 黄河学刊,1994(2):1-6.
- [17] 朱虹. 狄更斯小说欣赏[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18] 薛鸿时. 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评传[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责任校对 游星雅)